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一四期 ——
(二〇一三年十月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310b)

-
- | | | |
|--------|-----------------------------------|---------|
| 【回首文革】 | 黄永胜任总参谋长期间的一些事 | 黄春光·米鹤都 |
| 【读书札记】 | 林彪出走，几分主动？几分被动
——读余汝信《“九一三”回望》 | 丁凯文 |
| 【编者启事】 | | |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回首文革】

黄永胜任总参谋长期间的一些事

• 黄春光·米鹤都 •

◇ 黄永胜进京任总长

1967年的7、8、9月，杨成武作为代总长陪着毛主席在南方巡视。在这期间，武汉发生了震惊全国的“7·20事件”。当时，各地群众一般分为造反派和保守派，在对待军队和军管的关系上，造反派一般都反军，保守派一般都拥军。而毛泽东当时到武汉让陈再道调头，支持造反派。不支持拥护自己的，反而要支持反对自己的，陈再道转不过弯来。7月19号，王力、谢富治向“三钢”、“三新”等造反派又说了一堆支持的话，就把“百万雄师”这些所谓保守派群众给得罪了。他们强烈不满，于是把矛头指向王力等人。

毛泽东原本想的是，以我这么高的权威，亲自出马，抓一个典型，就把两派的矛盾给缓和了，实现大联合了，说明我毛泽东的权威。没想到，王力一煽呼，把“百万雄师”给惹火了。当群众运动真正起来以后，其实没有人能左右它。即便是江青到“百万雄师”那儿去讲话，“百万雄师”也一样反她。这时再骂陈再道，骂那个师长，群众和战士们也不听你的了。最后，陈再道说：我管不了了。其实，别说陈再道，就是毛泽东当时也管不了。最后，陈再道等人被打

倒。

就在主席巡视期间，8月17号，中央决定，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组成军委临时看守小组。实际上，吴法宪很早就跟叶群、林彪走得很近，叶、林对吴法宪也很信任。所以，这个小组实际是让吴法宪来负责。9月23号，杨成武跟着主席回到北京。9月底，就成立了军委办事组，杨成武任组长。但是这个局面没能维持很久。

1968年3月22日深夜，我父亲黄永胜正在主持广州军区的常委会，周总理亲自打电话来，让父亲连夜去北京，并说已派了飞机去接，飞机一到立刻来京。母亲还想让父亲稍微睡一会，父亲说飞夜航去北京，肯定有重要事，于是半夜就动身了。23日上午8点多，我父母乘专机到了北京。一下飞机，他们看到了吴法宪和邱会作来接，感到很奇怪。之前都是军委办公厅或总参服务处来个科长、处长接，这次怎么是吴、邱亲自来接呢？他们感觉不大正常。接着，吴法宪就陪着父亲去了人民大会堂，邱会作送母亲去京西宾馆。父亲到人民大会堂时，总理他们都在，就把杨成武带进来了。总理一脸严肃地对杨成武说：杨成武，你犯了严重错误，不能工作了。你把你那一摊儿工作交给黄永胜，回去做检查。此时，父亲才知道杨成武出事儿了。

实际上，在罗瑞卿被打倒之后，杨成武已上升为军队的一颗政治新星。为什么杨成武会成为军委办事组第一任组长呢？一方面，在军队的山头中，毛主席主要依赖的就是“双一”，即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林彪曾是红一军团的军团长。所以，长期以来红一军团的干部受到重用，就是因为是毛的嫡系。另一方面，杨成武聪明、有能力，主席、林彪对他都很信任。毛通过“7·20事件”也感到，必须要保持军队稳定，才能保证文革的进行。因此，毛对杨成武保持军队不乱是满意的，对军委办事组是信任的。林就更不用说了。此后，军委办事组替代了已经瘫痪的军委办公会议，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包括军事、政工及干部的任命等等。

后来我才知道，杨成武的倒台，是因为他和江青走得近了，说了一些让林彪伤心的话。据吴法宪回忆，杨在和他闹矛盾时，泄露了天机。杨说：如果咱们谈不拢，就到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谈，到江青同志那儿去谈。军队的事儿，他不说到林彪那儿去谈，这话叫林彪知道了就犯了大忌。

在林彪的部下中，应该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比杨成武跟林彪的关系更近一些。解放战争三年，杨成武没有跟着林，黄、吴、李、邱是跟着林的，林对这几个人更了解，对他们的工作能力也是认可的。另外，黄、吴、李、邱从小跟着毛、林，从瑞金一块儿走过来的，历史上也没有辫子可抓。所以，主席和林彪都对黄、吴、李、邱很信任，也放心使用。同时，这几个人没有罗瑞卿和杨成武那么高的地位，也没想到自己能到这么高的位置，对上来说这可能也更可信一些。

那天杨成武被押走后，总理跟父亲谈，要调他来北京当总长。父亲表示不愿意，他说：第一，我能力不行；第二，我资历不行。总理却说：这事儿我说了不算，这是主席、林副主席决定的。你是老同志，要懂得服从组织。父亲又去找林彪谈，说自己干不了。林说：这是主席亲自定的，我改变不了，谁也改变不了。就这样，父亲勉强接受，当了总长，并接替杨成武任军委办事组组长。但他开始时不参加中央文革的碰头会，如果涉及部队文革的事儿，就叫他去一下。

◇ 争夺对部队的控制权

我父亲是军委办事组组长，副组长是吴法宪，相当于军委秘书长和副秘书长。办事组往上

就是林彪、主席了。中共九大没有设军委常委，只有军委副主席。老师们都是军委副主席，有朱老总、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陈毅。

父亲刚来北京那会儿，也经常到主席那儿去。因为我时不时看到父亲回来，拿着小的便笺纸，上面记着主席和他的一些谈话内容。主席言传身教，对他进行一些教育，工作上给予一些指导启发。主席的特点是喜欢讲典故，让你回去翻书，自己去琢磨明白其中的政治意图，看你的领悟高不高。这也是主席的高明所在，给自己留有余地。如果说错了，就当是讲个典故，开个玩笑。如果你没按照他的政治意图办，被整了，那是你自己不聪明。典故都告诉你了，你怎么还没明白？应该说，主席本来对黄永胜是抱以厚望的，但黄在文化大革命的考试中没有及格，是主席拉着他走。

文革中，林彪及军委领导，包括叶帅、聂帅、陈老总等，他们有一个共识：中央文革不能插手军队。这是一条主线、一直贯彻着。当时，林和这些老师们看的很清楚，政府乱、省市党委乱都还好办，只要部队不乱就能撑得住。文革刚开始时，中央文革提出，部队包括基层连队都要开展“四大”。那时叶帅是军委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坚决顶住了，后来变成军以上单位可以开展“四大”。真要是军队的军以上机关都要开展“四大”，那也够呛呀！实际上有一阵子，总部和各大军区都出现了乱的苗头，也出现了一些造反派。如广州军区的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就支持机关干部造军区党委的反，沈阳、济南、福州等军区都有一些干部要起来造反。林彪、叶剑英等坚决顶住；后来杨成武当办事组组长，也坚决维护了军队的稳定。父亲当总长后，也坚守了这条线。

父亲进京以前，中央文革插手军队已经很深了，军委的文件都要报中央文革圈阅。那时候，部队调动的命令，到了江青、中央文革那里，一个星期也签不下来。但部队又不能不调，怎么办呢？就把部队拆散调动，今天走半个班，明天再走半个班。后来，父亲终于借机向主席汇报：现在军队调动的文件，传阅的人太多，一不利于保密，二应付不了突发情况，三影响部队工作安排和行动。如果打起仗来，将会上下不通气，影响战备。主席说：你写个报告吧。父亲向主席反映这个情况，一方面是怕耽误工作，但更主要的是不想让江青他们插手军队。结果，这个报告主席批了。以后军队的事情只报五个政治局常委：毛、林、周、陈、康。

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重要，因此江青也发了很大火，说我父亲封锁她。军队的文件不是不送她了嘛，她就让秘书把她的军装退给了我父亲，表示不穿这套军装了，给你点颜色看，从这之后，江青和我父亲的矛盾开始尖锐化。之后，中央决定让父亲去阿尔巴尼亚访问，江青就是不让去。而且还停止了父亲和吴法宪参加中央碰头会。结果是总理到主席那儿说了这事，主席拍板说：还是黄永胜去，碰头会也要参加。江青他们就不敢吱声了。从林彪到叶帅，到杨成武，再到黄永胜，军队不能乱是个大局，不让江青一伙儿插手军队，军队里不能有江青的人，这一直都做得很好。而林彪倒台以后，张春桥管军队，部队成什么样了？思想工作怎么样，部队战斗力怎么样，这是有目共睹的。

◇ 中央最大的政治

八届十一中全会前，林彪主要管军队，和江青之前并不来往。林当了接班人后，由于工作关系，和江青的往来才逐渐增多。开始时，叶群往江青哪里跑的很勤，常把江青的话当圣旨来听，认为江青的话代表主席的意思。林彪则始终坚持一点，只要你不插手部队，其他事都好说，不看僧面看佛面。但是中央文革的权力越来越大，开始直接插手军队的文革，支持军队的造反派。江青也更加颐指气使、飞扬跋扈，林彪开始对江青不满了。

应该说，当时知道林彪对江青不满这一情况的范围是非常小的。只有黄、叶知道林的一些

想法，开始邱和李都是不清楚的，因为黄、叶、吴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时，对于全国的工作，他们会在一起议论。在探讨工作的过程中，他们难免要议论到江青。这样，林的一些想法，父亲他们就知道了。林彪也明确交代，要支持总理的工作。

文革前，父亲和江青只是有很一般的接触，对她没有多少了解。父亲在广州时，江青去过几次。当时是中南局书记陶铸负责接待，让她住在给主席准备的房子里。他嫌院子里树上的知了太吵，就对陶铸抱怨。陶铸跟我父亲说：怎么办呀？父亲说：好办，派警卫部队去粘。于是，就派了警卫战士拿着竹竿粘知了。粘了几天，多数都粘走了，不叫了。但江青又提意见了。因为她住的那个小岛靠着珠江，晚上江面有船通行。有的船往来回鸣笛，江青又嫌鸣笛吵。于是，赶紧通知所有航行的船，晚上不许鸣笛。可有的船是从广西过来的，不知道啊，又鸣笛了。结果，江青又找陶铸闹。后来，一直到丁盛当司令员，江青去广州还是如此。

那时候，父亲就觉得，她的要求太过分了。那是航道呀，怎么连鸣笛都不让拉呢？即便是主席的夫人，也不能这样呀！比主席还难伺候，父亲不高兴，就跟母亲说。母亲就跟我唠叨：江青这个人真难伺候，连船都不让人家走，多耽误人家运输啊！那时候，父母对江青的感觉，就是觉得这个人太特殊，太难伺候，其他的倒也没有什么接触。应该说，父亲对江青态度上是尊重的，生活上是尽量照顾的。父亲对主席特别崇敬。正是看在主席的面子上，他对江青尊重，但是敬而远之。

其实，我父亲那个层级的干部，跟主席的生活还是隔得太远，也不了解。父亲只有在开会的时候，像五一、十一上天安门，给主席敬个礼，主席问一问而已。下面的封疆大吏，不知道上面的情况，更不知道中南海里面的事情，也没人跟他们讲主席和江青关系这些事情。军队的人住在中南海里的，只有朱老总和陈老总两个人，军队的大部分干部、甚至包括林彪在内，对毛和江的日常生活也是不了解的，对他们的政治关系更不了解了。所以，文革前和文革初期，父亲没有进入军委领导层之前，对江青出于礼貌是尊重的。1966年2月，江青在上海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之后，报纸上就开始宣传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这个帽子是谁给戴的？肯定不是林彪给戴的，能够上中央的报纸，应该是中央的负责人。江青既然当了旗手，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领导了文化大革命，又是主席夫人，人们对他就另眼相看了，觉得她不简单。

随着陶铸、王任重的问题出来后，父亲就感觉不能理解了。出于对主席的热爱，他在文革中拼命想跟，却怎么也跟不上。对造反派冲击公检法、国防部、中南海，把老干部往死里整等等，父亲都看不惯、不赞成。第一次在工人体育场斗彭德怀、黄克诚、罗瑞卿等人时，几个老帅和杨成武、肖华等都出席了，也让我父亲一块去了。他回来对我说：太残酷了，怎么能这样呢！都是革命几十年的老同志了，犯了错误也不能这样啊！以后再有这样的批斗会，他就拒绝出席了。

父亲是军人，性格比较直，面对江青的飞扬跋扈，有时他敢于顶撞。“二月逆流”前，在京西宾馆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江青也在会上讲了话。会上，各总部、各大军区和军兵种的高级干部对文革依然很不理解，对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冲击军队的做法有很大的抵触情绪。父亲就说了：江青同志应该听毛主席的话，中央文革应该听毛主席的话。甚至还为此拍了桌子。

父亲之所以敢顶撞江青，是因为他有自信。他16岁就跟毛主席上井冈山，就像项羽的三千江东子弟一样，是铁杆兵。况且，毛主席当时还没三千人呢。多年来他对主席一直忠心耿耿，毛交办的任务，都是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地完成。而且，父亲不仅忠于主席，对主席的感情也很深。1945年主席去重庆谈判，因为担心主席的安全，父亲到延安机场送主席登机时，还留下的担忧的眼泪。主席对他当然也是了解的。

而江青，刚进城时没那样，后来变成这样的，有一个发展过程。文革中，江青这个人不管不顾，管你是周恩来还是谁，说翻脸就翻脸，总理的工作被她搅得一塌糊涂。父亲对江青的一些所做所为非常不满意。在父亲看来，你江青不就是毛的一个老婆嘛，和这个党、和中央，以至和毛泽东都是两回事啊。

其实，对于毛泽东和江青的政治关系，我父亲，甚至包括林彪、杨成武这些人，我觉得都没看清楚。

据说陶铸文革初期调到中央，也不了解中央情况，就问总理：中央高层到底是怎么回事？要注意什么？周恩来说：正确对待江青同志，就是最大的政治。他的潜台词是，对待江青的态度，就是对待毛的态度，就是对待文革的态度。陶铸没悟透，多次和江青对抗，得罪了江青，导致自己倒台。这和后来总理跟黄、吴、李、邱讲的，处理好毛、林、江的关系就是“中央政治”是相一致的。应该说，对于毛和江之间的关系，总理还是比较明白的，中南海外边的人就不清楚了，总觉得主席和江青不是一回事。

后来，军委办事组和江青的矛盾不断加深，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汪东兴的误导。因为汪是毛泽东身边的大总管，他传过来毛和江的关系和一些事，并曾说：“毛和江是两回事。”林彪、叶群包括我的父亲他们都很相信他。可以说，对江青和毛到底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的判断，直接决定着人们的政治命运。

父亲被公审后，他才真正明白江青和主席的关系，他说：主席是用江青的，不是用我们的。

◇ 中共九大中央委员名单之谜

我当兵之后，去了云南的蒙自机场。按照规定，大学毕业生到部队应先下放锻炼一年，参加过“四清”的学生，可以减少半年。这样到1969年3月，我就完成了下放的要求，回北京到空军报到。吴法宪说：现在太忙，要开九大，你先回家休息一下，开完九大再说。

这段期间，我几乎天天在父亲起床之前，溜到他办公室翻看他公文包的文件，因为只有这个时候他办公室没人去。其实我上初中以后，就常带着好奇心，有机会就翻看父亲的文件。父亲属于比较粗心的那种人，他打开保险柜拿了文件，有时候就忘记关了，保险柜的门虚掩着。我的智商还算可以，看到那几个数字后，就开始琢磨，正转几圈，反转几圈，很快就把密码琢磨出来了。所以，父亲的保险柜对我来说根本不保险。我还翻看过他的内部参考。那是内部参考传阅的范围很窄，一个大军区好像就一份。有次，父亲发现我在翻看他的文件，说了一句：小孩子胡看什么！你是怎么拿出来的？我说：你自己放在桌子上的呀。其实，那次是我从保险柜里拿出来的。

这样，我当时看到了一份让我印象极深的文件，就是关于九大中央委员的酝酿名单。当时筹备组组长是总理，筹备组写了一份对张春桥历史问题和姚文元父亲姚蓬子历史问题的报告。在九大预备会议期间，这报告给主席报送过三次，内容是向毛主席反映：张春桥有叛变、反鲁迅的历史问题，姚文元的父亲是托派、叛徒、汉奸，他们是否合适进中央委员会？主席三次都没有表态，而且压住不发。那三次的报告，内容一样，我都见过。我还想呢，这个报过了呀，怎么又报上来了？后来发现，每次的信封不一样，信封上划了圈和没划圈也不一样。

这份材料和打倒“四人帮”时公布的那份材料一样。这样的处理说明了些什么？

还有就是关于政治局的名单，开始有江青，没有叶群。报到主席那儿，主席划掉了江青，加上了叶群。文件到林彪那儿，林彪划掉了叶群，但没有加上江青。过了一天，又看到新的名单，有江青也有叶群，但主席又划掉了江青，林彪则又划掉了叶群。不过，名单上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主席一直没有划掉过。

我很不理解，主席为何三次对上报的材料都不表态？

◇ “多了一张吃饭的嘴”

应该说，周恩来和军委办事组的关系是很融洽的。周的行为能力很强，在党内威信高，很善于梳理人际关系，而且长期在中央核心位居高位，很明白中央的权力架构。我父亲一直对周很尊重，很信任。对于军委办事组来说，因为林彪给我父亲有过交代：要支持总理的工作，有事你们要多向主席请示，多汇报，因此，他们非常坚定地支持总理。另外从办事组这几个人的心里来讲，从中央苏区一直到解放后，他们都是做具体工作的干部，而周是中央的核心领导。他们跟总理差了很多级，现在能跟总理在一起办公，那肯定以总理马首是瞻，非常敬重。总理交代的问题，都认真去办。同时，他们到总理那里请示军队的一些工作，总理也都给予支持的。特别是江青对我父亲和办事组的几次发难，都是总理从中斡旋或报告主席而解决的。

从总理的角度，一方面他对这几个人的历史了解，对他们也比较信任；另一方面文革中他也依靠以军委办事组为代表的军队这根支柱，支持了军队就是支撑住了全国。在很多问题上，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和后来的政治局会议之前，总理都和我父亲碰一下头，以取得一致意见。总之，总理对办事组是倚重的。有时候总理不好公开表示不同意见，就让让办事组出面把他们顶回去。军委办事组对江青的一些斗争，也向总理汇报，总理很清楚这些情况。一般来说，总理对于办事组和文革小组之间的矛盾，总是从中调和，但从没有偏向文革小组的意思。特别是当办事组被江青整的灰头土脸的时候，总理会主动向主席反映情况来斡旋。只要黄、李、邱不和文革小组针尖对麦芒，总理的稀泥总是和得很好的。用我父亲的话讲就是：周恩来就是八级泥瓦匠。不过，有时父亲对总理和稀泥也不太清楚。

说起总理的为人，那时还有这样一件事。九大前后，总理私下对父亲说：你们军队是否能把毛岸青的生活管起来。他在中央编译局，有人要做他的文章。他的身体也不好，军队管起来简单一些，也分担我的一点担子。父亲感觉总理开了口，又是主席后代，军队管起来也不是难事。于是，他同意了，找来军委办事厅、总参管理局的领导一起商量，把毛岸青一家安排在了西山原来一位副总长住过的大院子里，一直住到现在。把他的医疗关系转到了301医院，让他从此享受了军级干部的待遇。不久，总理又让父亲把毛岸青的所有关系都转到部队，也等于是让他参了军。

又过了不久，因为毛岸青的医疗关系已经转到了301医院，总理又跟父亲说：能否让301医院想想办法，让邵华怀孕，让毛主席后继有人。父亲对主席感情很深，感觉这是个好事儿。于是，他亲自找来301医院的领导布置任务，让他们把这件事当光荣的政治任务，提高到忠于毛主席的高度对待。

301医院曹跟慧副院长负责牵头，由妇产科、神经科、泌尿科、内科的顶级专家和护士组成了专门小组。他们首先对毛岸青和邵华进行了全面体检，把邵华安排住进了301医院妇产科。这一切对外都严格保密。由于那时中国还不掌握现代的试管婴儿技术，采取的就是人工受精。那时候，每天两人的身体情况，诸如体温、血压之类的简报，都要送到总长的办公桌上。我回家时经常都能看到。印象中，取精的过程并不是很顺利，而且第一次人工受精也没成功。不过，好歹第二次成功了。

1970年初，孩子生下来后，办事组的人当成是一个大喜讯。这件事，也反映出总理的一片用心。然而，不知为什么主席对这个来之不易的孙子并不感兴趣，身边的工作人员第一次报告，毛就没搭理。第二次又换了一个护士去报告，毛停下手中在读的书，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噢，世界上多了一张吃饭的嘴。”在他生命最后这六年多的时间里，他也一次都没见这个唯一的孙子。总理和父亲知道这一情况后，甚感无趣。

◇ “夫子”和汪东兴

在那个时期，陈伯达和军委办事组开始虽有沟通，但不多。比如，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类比，认为文革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江青就胡搅蛮缠，认为林彪没立场，贬低毛泽东，贬低文革。她说，我们搞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欧洲的文艺复兴是资产阶级的。同时，江青大概还觉得，文化艺术是我的领域，你凭什么涉足？于是，她还想批林彪的讲话。事先，陈伯达给林、叶通了气，所以，林彪也算早有防备。最后，总理也没把江青的文件拿到政治局讨论。

在我的印象中，陈伯达和军委办事组往来的增多，是在准备开九大时。之前我的父母很少讲到陈伯达的事情，九大筹备期间，我听母亲说：昨天，老夫子（指陈伯达）又来诉苦，哭鼻子了。你想，陈伯达一个文化人，又没有几个朋友，受了江青的气，他跟谁说去？跟总理说，总理那么忙，显得他太不懂事了；跟康生说，他知道康生是江青的后台。他没地儿说啊，只能跟林这边的人说，跟叶群说。陈伯达和叶群又是老乡，都是福建人。因此，陈和军委办事组交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陈受了江青一伙人的气无处诉说。

从办事组这边来看，我父亲对张春桥哪里看得起啊？说我们出生入死的时候，你在哪啊？你还有历史问题，算什么东西嘛？而陈不一样了，他不仅资格老，还是党的理论权威，看了那么多的书，人称“夫子”。他马列水平高，字写的好，诗又做得好，什么青铜器、瓷器、字画等都懂，咱们跟他一比，就是小学生啊。所以，办事组的人对陈伯达很尊重，从来不会跟陈发脾气，甩脸子。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期间以后，大家还经常在一起聊天，吃个夜餐什么的。陈就觉得，办事组这边比较亲切，能得到尊重。

陈伯达和办事组的关系近了之后，大家对江青的飞扬跋扈，总是给总理出难题的做法，就有共同语言了。另外，陈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他对毛和江的关系也是比较清楚的。陈给办事组这边说了一些情况，他私下议论江青，这边也愿意听。应该说，更主要的是在处理党、政、军的一些具体事情上，大家的意见是相同的。这期间，在中央文革和军委办事组有分歧的时候，陈伯达是站在办事组一边的。

汪东兴与办事组的关系，和陈伯达有些类似。据我了解，汪和林彪、叶群及军委办事组开始走得比较近，是在1969年春节之后。九大之前，汪东兴住院做手术，好像是胃部切除，但是也没人去看他、关心他。毛泽东身边的人，像康生、陈伯达，都是毛泽东的大秘、二秘，是毛泽东的忠臣近臣，江青对汪东兴就更不用说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叶群去看了他。去看了以后，他觉得汪挺悲惨凄凉的，就招呼我父亲和吴法宪，我不知道有没有邱会作，让我们经常去看看汪东兴。叶群在做人方面，还是远远胜过江青。按照叶群的吩咐，黄和吴时常带了水果去医院看，汪东兴很是感动啊！办事组还帮助安排汪东兴的孩子当了兵，在部队入了党、提了干。从资历和职务上来讲，黄、吴、李、邱都比他高。他觉得，办事组的人能来看我，真把我当个人。所以，他很感动。

1969年3月份，我从蒙自回到北京时，九大代表已经集中了，但等了好长时间没开会。

我就问母亲：九大代表不是早集中了吗？怎么这么久还不开会呀？母亲说：汪东兴动大手术了，不能开。如果开了，江青会封锁主席，消息就传不到主席那儿。所以要等汪东兴病好以后才开，说这是主席的意思。母亲说的情况后来得到了证实，九大的确在汪东兴出院以后才开的。当然，这一说法标明汪东兴在上传下达方面的作用是很大的。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汪东兴和办事组的交往逐渐增多了。但汪和办事组的关系变密切，还有一个过程。一方面看，大家说道江青，有共同语言；汪受了江青的气，也想找个倾诉者，找个同盟者。不然，汪东兴就得和江青单打独斗。另一方面，在工作上，办事组也需要汪东兴的支持。比如说，黄要见主席，跟汪东兴一说，汪马上跟主席说。也就是说，军委办事组跟汪搞好关系，是接近毛泽东的一条捷径。随着汪和办事组交好，汪东兴主动向办事组提供了不少新鲜的东西。

到九届二中全会前，汪东兴绝对跟办事组弄在一起了。1970年3月8日，汪东兴向政治局传达毛主席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会开完后，汪觉得意犹未尽，当天夜里12点多，又拉上黄、吴、叶、李、邱，跑到军委三座门哪里接着聊，还把这些人的老婆、孩子也都叫去了。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们都睡觉了，是被从被窝里拉起来去的。大家坐了两桌，大人们一桌，孩子们一桌。我们听到汪东兴说：这是好消息啊！主席让林彪同志当国家主席。主席说：若设国家主席的话，那就只有请林彪同志来当，我不当国家主席。林彪同志要当主席了，当然是好事，大家都很高兴。那天晚上，叶群兴奋得很，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来，一看就很高兴。这次，大概谈了一个多小时。

◇ 九届二中全会的风波

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从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之前的常委会可以看出一点问题。8月22日下午，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在主席处开会，谈到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时，并不是林彪一个人持这个意见。四个常委是从国家体制考虑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也是从这点上考虑希望设国家主席的。毛说：“反正我不当，可以让董老当，也可以让陈永贵当，还可以选工农兵来当。”不过他再也没有说过汪东兴第一次吹风说的“若设国家主席的话，那就只有请林彪同志来当”的话了。毛既然这么说，那只是个人选问题，而不是设不设的问题。所以四个那么老到的政治家，还是一致提出要设国家主席。这样，才能第二天开幕式上康生讲了一大段关于设国家主席的话。

如果毛真是像后来说的，先后四次坚持不设国家主席，且不说林、周、陈，康生是宪法修改小组的组长，他也不会准备了设与不设国家主席的两套修改草案。而且这次常委会后，总理还让张春桥准备好关于设国家主席的条文，张说的是现成的。可见8月22日的常委会上，对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仍无定论，所以才会有周、康的安排和之后汪东兴在小组会上大谈国家主席的问题。但是，后来却把设国家主席作为林彪、黄、吴、李、邱的反党纲领。

1970年8月下旬，九届二中全会开始的时候，父亲没有上山，留在北京值班。8月31日，主席突然通知，让父亲上山开会。父亲上山以后，总理和康生与他谈了很长时间，但一提到张春桥，父亲就说：张春桥是叛徒，跟主席汇报过多次了，他看不起我们这些大老粗。他没有说张的好话。从这儿也看出，对张春桥这些中央文革的人，父亲是从心底反对他们的。当时，主席对军委办事组、对父亲的批评也很严厉，但父亲并未察觉到毛、林有分歧，以及主席对林彪、对军队有不满的感觉。但是，如果父亲被拉过去了，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主席给林彪加的码就要重得多，就不仅仅批陈伯达了，主席可能就要揭林彪的伤疤，算他的历史老账了。结果，父亲不为所动，没有对文革表示坚决支持，主席才最终抛弃了他。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确实把矛头指向了张春桥。其实，当时也只能对这张春桥，对康生不可以，对江青更不可以，而张春桥又有历史上的辫子。当林彪在开幕式前向毛讲了准备讲的几个问题，毛也同意了，只是说不要点名。两人交谈了半个多小时，为此开幕式就拖后了，为了防止江青干扰，叶群还在毛、林谈话的门外守着。刚开始，可能毛没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但是，当会场群情激奋、大家都开始攻击张春桥时，毛愤怒了。

200多个中央委员，大多数都对文化大革命不满。他之所以愤怒，就在于大家借着攻击张春桥表达对文革的不满。而且是这么大一股势力和潮流，还是以林彪为首的。毛是不容否定文革的。所以，为了保卫文革，他保了中央文革那几个人，舍弃了部队这些跟着他打江山的人，也否定了政治局的大多数和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客观地讲，黄、吴、李、邱的确对江青的一些做法不满，但并不是对主席不满。在他们的眼里，主席永远是伟人，是领袖，是正确的，是不容怀疑的，是不可违背的。自己再怎么委屈，也要顾全大局，委曲求全。

九届二中全会后，父亲一直想不通，认为自己没错，拒绝检讨。总理做他的工作，做不通；毛泽东批评了他几次，他仍然不通；最后，总理让邱会作跟他谈了一次话，他才通了。邱跟他说：我们反宗派主义，现在我们不检讨，不也成了个宗派了吗？别人不也抓住我们的把柄吗？父亲实在是没什么可检讨的，就把向主席反映江青骂总理的事情，作为自己的错误来检讨，说自己干扰了主席。一看就知道，这是很违心的。

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前，林彪跟毛说他要检讨。毛说：主要是陈伯达的事，你不用检讨。林彪后来对毛的翻云覆雨很不满意，一直软抗，或不在北京，或不参加会议，拒绝检讨。黄、吴、李、邱这些人对文革也没有一个明确支持的态度。毛很不满，所以，他要倒林了。

“9·13”之前，我曾在父亲的公文包里看到过几页主席在南巡时的讲话纪要。那个讲话是铅印的，大号字。一看就是中央办公厅印的。毛主要讲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最后说：路线斗争中犯了错误的，为首的，改也难。这句话一下把我给惊倒，这不是说林彪吗？我当时浑身的汗毛孔都张开了。

◇ “9·13”那几天

9月12日是星期天，我父亲在家里理发，散步。我抱着五个月大的儿子到他那儿去，他挺高兴地逗了半天孙子。下午吃完晚饭，他就去开政治局会议了，那时候正在大会堂讨论四届人大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定稿。我丝毫没有感觉到有任何不正常的迹象。

13号那天一上班，还没感觉到什么。12号晚在地下指挥所担任战备值班的是林参谋。八点半左右，他交了班上来就汇报说：哎呀，项主任，不好了，出大事了！昨天一架飞机飞出境外，到蒙古那边去了。这是一架按照一等专机保障的三叉戟，从秦皇岛海军机场起飞的。我第一个反应是叶群还是林立果出事了，可我绝没想到林彪也在飞机上。然后我就问：为什么没打？为什么不打？他说：没有接到要拦截的命令，接到命令是坚决要把直升机拦截下来，就是击落。因为是夜间，当时不是所有飞行员都可以飞夜航的，通常机场只有两架飞机值夜航。张家口口的两架值班飞机就起飞拦截，但没有发现目标。现在部队在检查原因，为什么引导了四次进入，都没发现目标。其实，我们搞作战的都清楚，夜航，又是低空，直升机和歼击机速度差过大，并不容易发现目标。

林参谋还对我说：纪登奎昨天晚上就在我北空指挥所。今早，纪登奎还让他拿望远镜到山上去观察西郊机场有什么动静。他以为我消息灵通，接着问我：主任，到底出什么事了？我说：没听说啊。我昨天晚上九点多钟就睡觉了，一大早就上班来了。接着，参谋长就把我叫去

问话：知道出什么事儿了吗？我说：不知道。他说：你回家去问问。我赶紧回家，问了问我爸的秘书，他知道的情况和我一样。他还问：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我是北空的，我怎么能不知道，所有的雷达都是我们管辖的。他说：现在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作战部报过来，秦皇岛起飞了一架三叉戟飞机，昨天飞出了境外。别的什么都没报。我没有见到我父亲，秘书说我爸从昨天晚上离开家去开会，一直到现在没回来。午饭前，我告诉老婆说：跑了架飞机，不知道林家什么人出事了，情况不好。

下午，我回到单位不久，技侦团的报告来了。技侦团是归北空管辖，它的报告是送给司令部首长、作战处、情报处和我们防突办，另外还送空军作战部、总参作战部、总参情报部、空军情报部等，文件印数并不多。

从北空技侦团的监听情报看，当时蒙古方面是炸了营，惊慌失措。他们从雷达探测到一架大型机侵入。有的说：不好了，不好了，中国大型机入侵！有的问：怎么办？怎么办？有的说“赶紧去报告××顾问，说了个苏联人的名字。又有人说：××顾问休假，不在营房，找不到人。三叉戟速度多快呀，他们惊慌失措的劲儿还没缓过来，飞机一下子就过去了，就是那么几十秒。他们一时找不到头，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没有实施高炮进入一等应该采取的任何措施。还有一个原因是，蒙古那边有好多设施，比如说地对空导弹，但都是苏联部队在那儿驻守，蒙古方面没权利使用调动。

到了下午，又有一份报告送来。内容是：蒙古那边说入侵的那个目标坠落了，着火坠落了。它给中央提供了飞机坠毁的第一个情况。提供这份报告的那个台立功了。

当时我们作战部有一个副处长，那天正在下面一个高炮部队检查备战，那架三叉戟飞机就在那个高炮阵地上空飞过去。如果要下命令击落，刚好在阵地上头，而且9月13号那天是明月晴空，夜视线很好。那个处长回来后还跟我们说：哎呦，那个飞机那个大呀，飞得很低，如果当时要打，几炮就打下来了。

14日下午，邱路光（邱会作儿子）给我打电话说：你快回来，出事了，出大事了！我说：不就是跑了架飞机嘛。他说：林子着火了，树叶也烧光了，你快回来吧。我就明白了，那是说林和叶都出事了。回去后他跟我说，他爸爸回来了，说林和叶都摔死了。

我爸还是没有回来，我就又回去上班去了。16号傍晚，路光又给我打电话：你爸回来了，赶紧回家吧。

我爸是12号晚饭后离家，一直到16号下午才回来。

那天，我晚上十点多回到家。回家以后，我去爸爸的房间，看到他正在从保险柜里往外清东西。我就问：爸，听说林彪他们跑到国外摔死了？他说：你们知道了？我说：知道了。他大声喊着：跑什么跑，害死人！我就问：他们为什么跑？到底出什么事了？他说：我哪知道啊？

他告诉我：12号晚上政治局正开会，开到半截总理接了个电话，接完电话就把他从会议室叫出来。总理问：你听说北戴河最近出什么事儿了吗？他们（指林彪）家里闹什么矛盾了吗？因为中央的领导都知道叶群和豆豆关系紧张，常常闹出些矛盾。我爸说：不知道啊，没听说他们家里出什么事儿啊。总理就没再多说，叫他们回去继续研究政府工作报告，而总理自己离开了会场。我父亲就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9月18日是个周六，父亲回家说：看来没事了，主席还是信任我的，总理让邱会作带话

过来了。其实这是父亲在宽我的心。他对邱会作当时是这么说的：话是这么说，文章并不一定这么做呦！

黄春光口述，米鹤都整理

□ 《炎黄春秋》2013年第9期

~~~~~  
【读书札记】

林彪出走，几分主动？几分被动——读余汝信《“九一三”回望》

• 丁凯文 •

2013年5月，香港的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了余汝信编著的《“九一三”回望——林彪事件史实与辨析》，笔者很快就收到余先生从香港寄来的样书，拜读之后颇有一些个人的体会，愿写出来与读者共享。

### 一、披露原始状态的史料

有关林彪事件的史料和书籍，在过去已多有披露和出版。官方最早的资料是中共中央文件《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之二），《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1980年的“两案”审判后官方陆续出版了《历史的审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纪实》、《历史的审判续集》。这些官方的材料都是按照党的意志和政治上的需要制造出来的。特别是在邓小平主导下，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文化大革命这段复杂历史简化为毛泽东犯错，被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所利用。这成为日后林彪和林彪事件研究的指导思想，此后国内出版的大小相关书籍、文章也是按照这一思路而进行，鲜有突破和进展。本世纪初以来，有关林彪事件的研究在海外有了迅速和深入的开展，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刚刚问世的这本《“九一三”回望》可算是最新的成果之一。本书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历史资料汇集，第二部分是对相关历史的探讨和分析。

此书披露的有关史料有四件，1980年3月林豆豆写给中纪委的申诉材料原稿影印件、1970年和1971年叶群两次写给毛泽东的检讨、《“571工程”纪要》原件影印件和1971年8月到9月毛泽东南巡谈话纪要。

林豆豆写给中纪委的申诉材料此次虽然并非首次公开，但此书却是首次公开了林豆豆当年书写的手迹影印件。这份申诉材料最早见于李晨所著的《世纪风铃》一书，但该书披露的内容并不完整，也没有交代这份材料的来源和真实性，此后这份材料在互联网上不胫而行，还被收入《华夏文摘》增刊的“文革博物馆通讯”。日后史学研究者探讨“林彪事件”时多以此份材料为主。2012年9月，舒云整理的《林豆豆口述》由明镜出版社出版，该书首次完整地披露了林豆豆这份申诉材料。

《“九一三”回望》披露的林豆豆的申诉材料最大的特色就是这份材料最原始的状态。以往人们写文章或材料时，由于没有电脑，只能全部手写在稿纸上，再不断修改、润色，增删数次，几易其稿，最终定稿后再全部誊写出来，送交相关的机构。林豆豆这份材料也不例外。笔者相信，林豆豆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两案”审理之前应对“九一三事件”有过自己的思考。据国内出版的《特别审判》一书披露，“两案”审理的工作在1979年夏即已经着手进行，起诉

书的增删、修改前后竟然达49稿，到1980年5月起诉书已经大致完成。林豆豆的申诉也恰恰作于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份手稿誊写日期是1980年3月20日。

《“九一三”回望》不仅披露了林豆豆的原稿，还将其中修改、增删的部分也同时公开于众，读者和研究者可以一窥这份申诉材料的原貌。惟笔者认为，无论是林豆豆的原稿，还是后来的修改稿和誊清稿，均应视为林豆豆和张清林的共同回忆，因为这些增删或修改之处实际上是他们共同完成。这好比学者写作的一篇文章，在经过初稿、二稿，乃至若干稿之后确认了最终定稿，读者在阅读这份公开发表的文章时不会刻意追索学者最初那篇原始稿是什么样子。此外，我们似也不必过分追究这份最终定稿中的修改和增删部分，哪些出自张清林之手，哪些出自林豆豆之手，因为这其中的过程很可能是，林、张二人共同商量、讨论，而由张清林执笔完成了补充、修改，最后再由林豆豆完成誊清稿，送交中纪委。他们二人共同的经历、遭遇和苦难是一致的，他们所表达和申诉的思想也是一致的。所以，笔者认为，过度追求原始稿和最终的誊清稿之间的差别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

《“九一三”回望》中另一个较有价值的材料是叶群在1970年10月和1971年4月呈送毛泽东的两次书面检讨。以往官方的史料中，我们看不到叶群的这两份书面检讨，在官方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人们可在毛泽东对叶群检讨信的批语和批注的注释中看到叶群检讨信的片言只语。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由于林彪带头批评了文革极左派的张春桥，引发了绝大多数与会者一片“揪张”的浪潮，为了保护张春桥和维护文革大业，毛泽东抛出陈伯达作为严厉打击的对象，在会议之后又揪住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等人不放，逼迫着几员大将作检讨。叶群正是看到了汪东兴在庐山上向毛泽东递交了一份无关痛痒的检讨后过关，也想仿效以求得毛泽东的宽容和谅解。但是叶群不是汪东兴，毛泽东揪住叶群的检讨予以狠批，实际上批的就是林彪，叶群的检讨实际上也是林彪检讨的代名词。由于林彪采取了“软顶”的策略，拒绝公开检讨，毛泽东也只能抓住叶群的检讨予以狠批，惟此时的毛泽东还不能立即与林彪翻脸决裂，还要一步一步地迫使林彪就范。叶群的检讨恰恰反映出庐山会议后林彪和军委办事组面临的尴尬处境，同时也可看到毛泽东是如何对林彪步步紧逼的。

《“571工程”纪要》在世上早有披露和流传，无论是公开的出版物还是互联网上都可查到。《“九一三”回望》将《“571工程”纪要》的原文影印件公布出来，让研究者可以更深入地探讨林立果和他身边的几位有识之士的大胆之想。一向以来，有些读者和研究者怀疑这份资料的真实性，认为这其中也许有官方的编造成分或故意嫁祸于人。但是笔者认为，这份颇具闪光点材料不是后来官方人士可以编造出来的，比如其中的遣词用语就具有林立果等人的明显的特色，如称毛泽东为B-52，称自己的人为“舰队”或“联合舰队”等，这些都与林立果等人当时看过的一些战争片有关，一般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有这种语言和思维。更何况，即使官方要造假也大可不必写下那么多对毛泽东严厉谴责的批判话语。由此之故，笔者认为，这份《“571工程”纪要》应出自林立果和他身边人周宇驰、于新野之手，这份原始资料的影印件颇具史料的价值。

毛泽东1971年8、9月的南巡谈话纪要的官方版本可以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找到，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在那短短29天行程中的主要谈话内容。中共中央称毛的南巡谈话为“纪要”，是因为这是经过加工和整理后的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并非毛最原始和最完整的谈话记录，甚至也远远不及汪东兴在其回忆录——《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所叙述的那般详细。从这一“纪要”和汪东兴的回忆，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如何精心策划一幕“倒林”的大剧，那就是通过南巡谈话，为林彪量身定做一项“想当国家主席”而达到“篡党夺权”的“谋反”大罪，毛泽东谈话的主要目的就是地方大员们尤其是军队将领们统一到毛泽东倒林的步骤上来。无论是毛的谈话“纪要”还是汪东兴的回忆，都没有涉及到毛泽东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的一段谈话。据刘丰日后向邱会作透露，毛泽东公开鼓励刘丰在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

全会上向林彪发难。邱会作日后就曾直言，这是毛在背后发动中央委员们向林彪直接开火，他好坐收渔利，这也是毛惯用的手法。笔者认为，无论现在官史如何为毛涂脂抹粉都无可否认这个事实：毛泽东南巡谈话所揭示的恰恰是毛泽东本人才是真正玩弄阴谋诡计和搞分裂的人。

## 二、揭露专案制度的黑暗

林豆豆的申诉材料大致写作于1979年下半年和1980年上半年期间，主要针对中共中央主导的“两案”审判。由于这是林豆豆个人的回忆，这份申诉无疑具有相当的分量，值得研究者们的重视。

（1）林豆豆的申诉材料揭露了中共专案制度的黑暗。1971年9月18日发布的中央57号文件对林豆豆的定位是：“在紧要关头揭发林彪、叶群、林立果私调飞机、阴谋叛国投敌，为党立功”。然而，恰恰是“为党立功”的林豆豆在此后受到了严酷的政治迫害。“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林豆豆和张清林即被秘密关押监禁，专案组负责出面审讯的人就是毛泽东的亲信——谢静宜。谢静宜采取的审讯方式就是逼供信，强迫林豆豆和张清林“提供所谓林彪‘两谋一叛’的罪证”。林豆豆说，负责林彪专案的纪登奎更是“多次专门作指示，定调子，划框框，派他的人逼我们按他的调子写材料，翻查、审问和逼交我向周总理写的材料，甚至勒令我们停止给周总理写材料，而只准给他们写材料。”有关各种逼供信式的审讯，刘家驹在其《我写林彪传的遭遇》一文中有具体的描述：谢静宜奉毛命要求林豆豆交待“‘九一三’事件的经过；林彪手令怎么来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幕后；林彪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关系；特别要追查9月12日晚上叶群和周恩来通话的内容”等。当谢静宜得不到她所需要的内容时，“不得不天天来施压，争吵”，后来谢“想出新招软化张清林，把她俩分开，各住一座楼。要张清林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跟她合作……三人苦争苦斗了半年，张清林被迫起草了一份交代，谢静宜修改后交豆豆重抄，送给了毛泽东过目。”“豆豆回到空军，空军派出著名女飞行员诸惠芬等三人来轮番地予以‘帮助’。中组部部长郭玉峰和公安部副部长李震三天两头来查案情。……豆豆被视为林彪留下的‘钉子’，由空军报组织人大会批、小会斗。”（刘家驹《我写林彪传的遭遇》，载《炎黄春秋》2013年第3期）如此逼供信而来的揭发交待材料是个什么样的货色，对文革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那不过就是黑暗的专案审查制度的产物。

（2）林豆豆作为“九一三事件”的当事人，其申诉书较为完整地叙述了9月7日到12日北戴河林彪住处发生的事件，虽然有若干情节的细微之处还应与其他当事人回忆综合起来加以考证。这份申诉书中大约有15000余字直接涉及“九一三事件”，而重点的内容则是9月12日当晚所发生事件的整个过程，其中涉及到叶群、林立果的想法和活动，林豆豆为何通过中央警卫团——即8341部队反映情况要求警卫部队保护林彪的安全，林彪在当天晚上的状况，林豆豆和林办工作人员为阻止林彪一行出走所做的工作，8341部队在北戴河负责人的态度，“中央”对8341部队的指令，林彪一行人出走时的具体情况等。从林豆豆这份申诉材料来看，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从林豆豆当晚10时左右向8341部队报告到林彪一行人离开北戴河这大约2个小时的时间里，林彪的警卫、秘书、内勤和8341部队的主要负责人都不同程度地卷入这起事件。林豆豆先得到北戴河8341部队负责人的积极回应，但是在后来却一反常态，以要听中央命令为名拒绝林豆豆的再三请求，中央也没有向8341部队下令采取任何措施拦阻林彪一行，最终林彪、叶群、林立果一行仓促离开北戴河前往山海关机场。日后我们知道，当时周恩来通过吴法宪向专机驾驶员潘景寅下令不准起飞，及通过李作鹏向山海关机场调度室下令没有周恩来等四人的放飞指示飞机不能起飞。惟这两项措施实际上都未起任何作用。如果8341部队能及时得到中央的指令阻止林彪出走，他们完全有能力完成这一任务，林彪一行无论如何也走不成。

（3）林豆豆的申诉材料完全否定中共中央多年以来对林彪事件的定性：林彪成立了“反

革命阴谋集团”，从事了“反革命阴谋政变”、“谋害毛泽东”，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豆豆说：“作为我及张清林，有自己不少的错误、缺点和失策，政治上非常幼稚、天真，走了不小的曲折弯路，对党和人民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但是‘莫须有三字，无以服天下’！康生、‘四人帮’他们及其一伙脚踏实事求是的原则所强加于林彪一身的诬蔑不实之词，以及对我们的诬陷和迫害，正如我们于1979年1月2日给中央的信中所表示的，我们一概不接受！”林豆豆和张清林强调说：“根据我们所知道的全部事实的总和，我们认为：林彪根本不是所谓搞‘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不是所谓‘阴谋反革命武装政变’、‘谋害毛主席’、‘叛国投敌’的，不是什么‘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这只不过是坚持我们原来的观点而已。在九一三事件之前、之中和之后，我们不仅明确无误地说过这类观点的话，而且我们在九一三事件中合乎逻辑的言论和行动也毫不含糊地更有力表明了这一点。不仅我们确信无疑地这样认为，而且原‘林办’工作人员和8341部队的不少干部和战士至少在北戴河也是这样认为的，并且基于这种认识和我们的请求而激发和表现了他们为党和国家负责的主动行动，尽管这种行动遭到了人为的破坏。”

林豆豆申诉材料集中体现的一条主线就是，林彪并非“反革命集团主犯”，并非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林彪也从未预谋“政变杀毛”，更没有“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等，那些加诸在林彪身上的罪名不过就是“莫须有”而已。

### 三、剖析申诉材料的问题

作为一份个人的申诉，林豆豆的材料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天穹在《研究林立衡材料的几个切入点》作了深入、细致的剖析。从这篇文章来看，作者天穹是一位比较了解林豆豆及林彪家庭的圈内人士。因此，天穹在分析林豆豆、林彪家庭以及林彪在文革中的具体活动有独到的见解，值得人们予以重视。

首先，天穹分析了林豆豆与叶群的关系。林豆豆与叶群关系不睦，这在以往林办秘书们的回忆中多有涉及，其主要原因出自严慰冰的匿名信，这些匿名信挑拨林豆豆与叶群的母女关系，无中生有地造谣叶群不是林豆豆的生母。这些匿名信给林家带来了无穷的烦恼，也对林豆豆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致使林豆豆与叶群之间的关系产生深深的隔阂与猜忌。天穹指出，叶群作为生母，在关心照顾林豆豆的生活、学习、工作方面可说是尽了母亲的职责，有时甚至是溺爱。天穹在文中举出很多事例，有些也是笔者所知的。天穹认为，林豆豆与叶群之间产生如此的矛盾不能说林豆豆完全没有责任。这应该是一个中肯之言。天穹认为，林豆豆在申诉材料中对叶群的一些叙述不符合实际，如叶群长期欺骗和控制林彪，叶群是“九一三”林彪出走事件的祸首等。天穹进而指出：“叶群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的夫人，是军委办事组成员，是政治局委员，是能同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等中共顶尖人物近距离接触的人，我们要在这个范围内衡量叶群才有意义。”“妖魔化”叶群“是要影响到对叶群在文革中的政治作用的判断的。”

其次，天穹分析了林豆豆与林彪的关系。林豆豆是林彪的女儿，生活这样的帅府家庭中，耳濡目染自然会了解一些外人所不知道的事情，甚至一些中央高层的内幕，这从林豆豆的申诉材料中可以找到很多。但是这种了解的来源和渠道是什么，这些了解又深入到什么程度，其可靠性如何，都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的。有些来自林豆豆的亲身经历，如有关罗瑞卿的问题，还有的也许来自林办或其他知情人士等。但是林彪会否向自己的女儿做出什么政治方面的嘱托则是大有疑问的。天穹由此质疑林豆豆在申诉材料中所言“代表林彪”，“并执行他的意志以及他多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他病重时对我的嘱托。”天穹进而指出：“林彪在家庭生活中曾经表示过对林豆豆某些方面支持的只言片语，被演绎成林彪对叶群政治立场和对大是大非的态度，肯定是错误的。”

再次，天穹用了很大的篇幅探讨了叶群和林彪的关系。针对林豆豆申诉材料中“叶群对林彪欺骗和控制”说，天穹表示了不同意见。天穹指出：“叶群没有中央分配的独立工作，她的工作几乎就是中央和林彪的联系人、军委办事组和林彪的联系人，叶群不参加军委办事组办公……叶群在文革的重大问题上几乎没有单独的意见和态度，林彪的利益和荣辱就是叶群的利益和荣辱，这点叶群很清楚，也是叶群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因此林彪和叶群的‘政治’关系，‘革命’关系是好的，这是林叶关系的基本点。”天穹在文中举出了大量的实例证实林叶政治关系上的一致，诸如文革中反对军内的造反，对军中老干部们的保护，反对中央文革插手军队等，乃至在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支持林彪发起的对文革极左派张春桥的批评。最后叶群不得不代林彪受过，向毛泽东作检讨，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与军委办事组黄吴李邱几员大将们一起被毛泽东作了政治结论：“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天穹认为：“把林彪在文革中的错误，归结成是叶群对林彪‘欺骗和控制’而误导了林彪，使林彪说了错话，做过错误的决断，甚至‘九一三’事件也是叶群（及林立果）对林彪的欺骗造成的，林豆豆的杜撰本身就是政治上无知的表现。”笔者认为，天穹的这一看法应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叶群在某些问题上对林彪有善意的欺骗，特别是生活方面，但是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叶群与林彪是一致的。现在我们回首这段历史，叶群在政治上的表现确有很多可议之处，诸如缺少严酷的党内政治斗争的历练，缺乏内敛和深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对林彪言路的堵塞。尤其是叶群在政治斗争面前沉不住气，被突如其来的事件搞得六神无主、一时间惊慌失措，乱了方寸和手脚，最终有了“九一三事件”惨剧的发生。笔者认为，在“九一三事件”中，无论是叶群、林立果，还是林豆豆，他们都想替林彪作主，甚至主导林彪的行为，都以为只要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就会取得最好的结果。殊不知，他们都没有应付党内重大政治斗争的经验，在老谋深算的毛泽东面前，他们的政治思维不过就是小儿科。如果，林彪依旧按兵不动，毛泽东要想拿下林彪还要费很大的气力。只要林彪还有一口气在，林在毛的身后仍有机会翻盘，而不致落的身死蒙古大漠的地步。

此外，天穹的文章还涉及文革期间林彪的医疗保健问题，贺龙倒台的问题，文革中林彪对彭真的态度，汪东兴与林彪、叶群的真实关系，以及林彪与毛泽东的关系等。天穹着重指出：“文革中，林彪哪些错误是跟着毛泽东和中央的路线犯了错误，哪些是讲了违心的话，哪些是对毛泽东吹过了头，哪些是伤害了一些干部，又有哪些是对林彪的栽赃，哪些从过去看、现在看都不是错误，这是要下功夫的。”天穹这些问题的提出都有助于人们对林彪、对毛泽东和文革史的进一步的思考。笔者在此还愿对此加以补充，即我们在探讨文革及其历史人物时，还应对中国政治制度予以深入的考察和剖析，在这种皇权专制的统治下，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实为君臣关系，君主可以提拔臣子为“接班人”，赋予“副统帅”、“亲密战友”这样耀眼的头衔，让你拥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但是君主也可以在一夕之间变脸，将臣子打入十八层地狱，历朝历代这类的事例屡见不鲜。历史早已证明，在中国这种传统的专制政治体制下，所谓的革命友情、亲密战友是靠不住的，臣子也是没有独立人格的，更不能“僭越”君主，一旦被君主所不喜，臣子随时都会被安上一个“谋逆篡位”的大罪，立有杀身之祸。林彪的倒台就是当代史上最鲜活的一个例子。如果我们不能从政治制度上找到原因并予以彻底改变的话，林彪被“诬以谋反”的这类情节就会不断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重演。

天穹在文中对林豆豆颇有一些批评，笔者认为有些批评是语重心长，恨铁不成钢的，但是有些批评似乎还是言重了。比如天穹认为“林豆豆爱说假话”，“从基础上（林彪、叶群、林豆豆之间的关系）就编假话，大事小事都在编”。林豆豆申诉材料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有些是林豆豆本身思想认识问题，有些是历史局限性，还有些是言不由衷，不能一概而论地指责林豆豆故意编瞎话。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中国民众的思想还受到长期以来党化教育的束缚，其解放程度也远远不像现在这样开放，林豆豆长期被关押与世隔绝，手头也没有什么资料，全凭自己的记忆和过去的感受。此外，林豆豆急于为父申冤而在申诉过程中缺乏严谨的

思考等。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其申诉材料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简单地指责林豆豆编谎话显然不够客观，还是应该作具体的分析为好。笔者认为，林豆豆的申诉仅仅是当事人留存下来的史料，史料不应与真实的历史简单地划上等号，研究者应该对照其他史料，尽可能地还原那段真实的历史。

#### 四、“九一三事件”考疑

《“九一三”回望》一书中有两篇文章对“九一三事件”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and 探讨。一篇是韩钢先生的《“九一三”事件考疑——以〈林豆豆口述〉为中心》，另一篇是余汝信先生的《〈林立衡关于“九一三”经过写给中纪委的材料〉解读》。这两篇文章的侧重点不同，但都围绕着林豆豆的申诉材料作了较为深入的考证和分析，值得研究者的关注和进一步探索。

韩钢在文中特别强调，虽然林豆豆的申诉材料是“记忆性质的史料”，也属于第一手材料，“但不宜简单采信，而需要与其他史料比对和参照，或证实，或证伪，或存疑。”针对林豆豆的申诉材料，韩钢重点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

- （1）林立果同林豆豆谈了些什么？
- （2）林彪对毛泽东的南巡谈话有何反应？
- （3）林彪到底要去哪里？
- （4）林彪是如何从96号楼出走的？
- （5）林彪想“外逃”苏联吗？

关于第一个问题，林豆豆的申诉材料并未有只言片语的透露，只有林彪的警卫参谋李文普以及林立果当时的未婚女友张宁的一些回忆。但由于此二人都不是当事人，他们转述的内容也还要有林豆豆的出面证实。韩先生还引用了原空军政委高厚良的口述，高指出林立果向林豆豆披露了他的想法，即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和谋杀毛泽东。韩钢认为，高不是当事人，也没有指出材料的来源，高的说法难以作为参考依据。笔者认为，高厚良是原空军专案组的负责人之一，他的说法应该来自当年那些专案组逼供信搞出来的材料，那个年代为了迎合中央政治上的需要，他们当然要在材料上“坐实”林立果的“政变计划”。惟这类专案组的材料可信度极低，现在的史家自然难以选用并相信他的说法。

关于第二个问题，林彪对毛泽东南巡谈话的真实反应。迄今为止竟然没有任何“九一三事件”的亲历者披露相关的史实。韩先生推断，亲历者完全不知道林彪的态度；亲历者虽然知情，但由于种种原因而不愿披露；林彪没态度或深藏不露；林彪根本不知道毛南巡谈话。韩钢的结论是，“只要史料不充分，很难确认林彪主谋或参与了杀害毛和‘南逃’的策划。”笔者认为，据各种资料，毛泽东的南巡谈话实际上已经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北戴河林彪处，叶群也由此而变得惊慌失措，林彪不可能不知道。但是没有任何具体的证据证实林彪知道毛谈话后主谋策划杀害毛泽东或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实际上，林彪当时在北戴河的行止是更加沉默寡言，消极以待，没有任何反常的举动，这与毛泽东的积极主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共日后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必须要给林彪安上这样一个“谋反”的罪名。

关于第三个问题，林彪到底要去哪里？韩钢根据几位当事人的说法，林彪、叶群都曾说过要去大连，也商量过去广州，而去大连似乎又是林彪一行临动身时的目的地。韩先生认为“叶群说去大连，很可能是为掩人耳目；但林彪要去大连，是同样掩人耳目还是仍旧坚持原意呢？又是一个悬念。”笔者认为，林立果和叶群在知悉毛泽东的南巡谈话内容后，深知毛下一步的整肃步骤一定会接踵而至，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一走了之。但是逃到哪里才安全恐怕也还没有完全想好。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要逃亡就必须有林彪的首肯。对林彪而言，不管逃到中国哪个



地方都是不安全的，大连、广州与北戴河又有什么区别？唯有逃到国外方保无虞。然而这恐怕也是最难说服林彪之处。笔者推测，在说服林彪离开北戴河问题上，叶群和林立果是一致的，只要林彪上了飞机，飞机掌握在林立果的手上，到时候林彪也不得不承认飞到国外的既成事实。

关于第四个问题，林彪是如何走出自己的住所的。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说法。韩先生引述了这两种说法。一是林豆豆和张宁的说法，林彪是在服用安眠药后睡眠时被叶群等人从床上拽起来而走的。另一个是李文普的说法，即林彪是自己主动出走的。此外，还有林彪的两个内勤在“九一三事件”后写的揭发材料，这些揭发材料也说林是主动出走。韩钢认为林豆豆的说法是个孤证，张宁的说法更让人生疑。笔者认为，这里涉及到谁的说法更可信以及是否允许这些仍然在世的人开口说真话。我们知道，中共的专案组最通常的手段是先定罪名，后搞证据，也就是罗织罪证。具体到林案，同样也是中央57号文件定性林彪为“狼狈投敌，叛党叛国”在先，日后专案审查的方向也必然是按照这个罪名收集证据。据笔者对张宁的采访，当时林办全体工作人员被关押在“亚疗”，专案组面对面细审林彪出走前的一举一动，当时林彪的两个内勤都说林彪是服用了安眠药在睡眠时被叶群、林立果拽走的。至于内勤的那些揭发材料，不排除他们不得不按照专案组的口径而写，类似的揭发材料在文革中屡见不鲜，不足为奇。至于李文普所述的情况，专案组以三项条件换取了李文普的那句林彪在汽车上问“到伊尔库茨克要多长时间”。李文普按照官方口径描述的“九一三事件”又有多少可信度呢？据笔者所知，林彪的两个内勤都还在世，但是他们却都三缄其口，从不接受采访。如果他们敢于开口说话，林彪出走时处于何种状态应该不难搞清。

关于第五个问题，林彪想外逃苏联吗？关于林彪想外逃苏联一说，只有官方版本的李文普说。韩先生认为李的口供成了孤证，考证起来已经十分困难。但是韩钢还是就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如李文普在跳车后为何不主动向上级报告，及至林彪飞机起飞后李仍未报告。这些都是疑点。其实笔者认为，我们应该把李文普的“跳车”、“自伤”和后来的“交代”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李文普在危急时刻跳车，放弃了自己保卫林彪的职守，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疑问。如果李文普知道了林彪要外逃，作为共产党多年培养的警卫人员，他应该挺身而出，与之斗争，而不是临阵脱逃。即使当时没有这么做，那么也应该在事后立即向上级报告。但是李不仅没有这么做，反而在跳车后自伤，摆明为自己找了后路。后来李在专案组的压力下作出了林彪在车上问“到伊尔库茨克要多长时间”这一孤证，成为林彪“主动外逃”的唯一证据。这一“证据”又有多少可信度？相信研究者心里都有答案。

韩先生在《考疑》中提出的问题都很关键，是“九一三事件”中的要害问题，韩钢虽然对上述所提出的问题并未给出具体、明确的答案，但是却有助于人们进一步的思考。笔者认为，“九一三事件”的当事人在事后的回忆、揭发、交代等要做综合的分析，回忆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政治环境下、乃至各种错综复杂的厉害关系面前，他们提供出来的说辞必然受到相当的影响，更不用提现在国内的政治环境仍然不能让这些人在没有压力的条件下畅所欲言。因此，我们在讨论相关问题时就必须考虑到这些因素。当事人在关押审查状态下的揭发交代材料，大都带有明显的专案组逼供信的痕迹，可信度并不高。此后，一些当事人在国内刊物上发表的回忆依然受到这类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些回忆在出版时被删削、修改和加工，凡不符合官方说辞的“回忆”是无法问世的。反而倒是那些在港台出版的回忆更能说真话，如吴法宪、邱会作和李作鹏等人的回忆录。

## 五、林豆豆的作为与失策

林豆豆是“九一三事件”中的关键人物，既是该事件的重要当事人，也是林彪一家唯一的幸存者。林豆豆的个人回忆和申诉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如何判定林豆豆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同样是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根据官方在林彪事件后发布的57号文件的宣传口径，

林豆豆“在紧要关头揭发林彪、叶群、林立果私调飞机、阴谋叛国投敌，为党立功”。坊间一些人士的评论也大都将林彪出走而最终罹难于蒙古温都尔汉归咎于林豆豆的举报。以往史学界就这一问题的论述并不多，余汝信的《〈林立果关于“九一三”经过写给中纪委的材料〉解读》对此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

余先生认为，林彪的被迫出走首先来自于毛泽东的步步进逼。由于林彪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打击了毛泽东的文革红人张春桥，触动了毛泽东的文革底线，引发了毛泽东的强烈反击。毛泽东明里批的是陈伯达，实则将矛头对准林彪和其麾下的军委办事组，叶群在毛的压力下不得不作检讨，毛对叶群的检讨作了极其严厉的批示。余先生指出：“毛泽东给高级干部的检讨写如此‘细致’如此严厉的批语，从1959年那一次庐山会议批‘彭黄张周’后从未有过。”其实，毛表面上狠批叶群，实则是狠批叶群背后的林彪。林彪则以沉默对待之。毛对林彪的进一步的进逼就是1971年8月的南巡讲话。在8月15日到9月12日这短短的29天里，毛巡视南方，与各地领导人，尤其是大军区首长们谈话，将矛头对准林彪。很明显，毛的南巡讲话是在为“倒林”做好舆论和组织准备，下一步将会在9月份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上“揭盖子”。余先生指出：“毛泽东的南巡讲话，已将林彪逼到墙角。就看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如何整治林了。”可以说，毛泽东的步步进逼是因，林彪一家逃亡是果。笔者对此深以为然。

余先生对林豆豆材料中所言“代表和执行林彪的‘意志’和‘嘱咐’”持有不同的看法。笔者也认为，搞清楚这一点才是搞清楚林豆豆在“九一三事件”中的所作所为的关键点。余先生指出，林豆豆的申诉材料并没有说明“什么是林彪的‘意志’”，林豆豆在那几天中也没有直接了解过林彪的态度，甚至连“直接沟通的尝试都没有”。此外，林豆豆也夸大了林彪的“病重”状态。余先生认为，林彪的“身体状况和思维能力都与常人无异”。笔者认为，林彪有病确实不假，据林办的秘书和医生所言，林彪除了原来就有的一些较为严重的病症外，还患有相当严重的抑郁症。但是林彪是否患病到失去自主意识则是大有疑问的。林豆豆之所以在申诉材料中持有这样的看法，也许更多的是为自己在申诉材料中叙述“九一三事件”中的作为预作铺垫和解释。换句话说，林豆豆强调了林彪的“病症”与无助，“九一三事件”中出走的责任就可以归结到叶群和林立果身上，也为自己在9月12日当晚竭力设法阻止林彪被裹挟出走的行为作了恰当的解释。当然，在林彪出走问题上，林豆豆的说法并非全无道理，还需要研究者作更深入的分析 and 探讨。

林豆豆的申诉材料的叙述主要是从1971年9月7日起，而9月12日当晚发生的事情则是其重点论述的内容。余先生就几个关键性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林豆豆从林立果处了解一些情况，知悉了林立果的一些想法，由此找了部分警卫人员打招呼，防止林彪被叶群和林立果劫持到外地，但是林豆豆并未采纳警卫人员的建议向上级报告。林豆豆自己耽误了从9月7日到12日这整整五天的时间。

（2）叶群曾向林彪提出“去广州不行，去香港也行呀”，林彪对此没有表态。这说明叶群在设法出走的问题上并未欺骗林彪。因此，林彪在9月12日当晚出走的目的地应该是国外，只有到了境外，才能彻底摆脱毛的控制。

（3）林豆豆编织了“林彪被骗”的神话，是因为林豆豆面对官方给林彪戴上“叛徒、卖国贼”的帽子而不知所措的反应。

（4）9月12日当晚，林豆豆已经明白，林彪、叶群、林立果三人与毛泽东决裂的态度是一致的，林豆豆向8341警卫部队报告是因为她自己已经“不可能在林家内部阻止这一决裂的过程”。

（5）林豆豆希望自己能够将事件局限在北戴河，并试图将林彪与叶群和林立果分离，以为这样即可保住林彪，这实在是对党内政治斗争天真无知的表现。林豆豆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现实的。

（6）根据林彪内勤和警卫的揭发材料，林彪离开北戴河住地是主动而为，林彪也是自己从飞行员的简易舷梯爬上飞机的，由此也可证明林彪的自主能力。林彪应该清楚，这次并非是正常的出行，而是一次“前途未卜的仓皇逃命”。

（7）“九一三事件”并非毛泽东、周恩来设计出来的阴谋，而是一起突发事件。8341部队既无经验可供借鉴，也无处置预案可遵循，在没有上级明确命令情况下不可能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因此也就谈不上有什么阴谋了。

余先生对“九一三事件”作了如此细致和深入的分析，其中一些看法笔者也有同感。笔者感到这里还有几个问题值得继续探讨：

（1）林彪的出走，有几分是主动，几分是被动？林彪是否在出走前就已经完整地知悉叶群、林立果的逃亡计划？如果林彪事先就已知悉叶群的逃亡计划，林彪对此又是什么态度？林彪又做了哪些必要的准备。在国内不管到了哪里：无论是广州还是大连，与待在北戴河殊无二致。如果要逃亡，唯有国外才安全。但是从现有的材料来看，林彪并无任何表示要到国外避难，也没有做任何这方面的准备。专案组经过多年的审查也没有发现这方面的蛛丝马迹，仅凭个别林彪内勤偷听来的叶群说话的片言只语似乎还难以论断林彪同意或默认了叶群的逃亡计划。李文普在审查期间交代的“林彪问到伊尔库茨克要多长时间”应是专案组逼供信的产物，不足为信。其实，官方如果真的掌握了林彪主动叛逃的证据，何须如此大费周章地压迫李文普作伪证？

（2）以林彪对毛泽东多年的了解，林彪应该知道毛泽东南巡讲话的目的何在，那就是要对林彪下杀手了。叶群的表现是惶惶不可终日，林立果则更像一个“愤青”，无厘头地要“奋力一搏”。那么林彪是否知悉林立果在北京的活动？目前也没有材料证实林彪知悉林立果的活动和《“571工程”纪要》，那个林彪的“九八手令”居然出现了三个不同的版本，且来路不明。官方所言的林彪要搞政变和杀毛，都属天方夜谭。从林彪一直处于被动和沉默的状况来看，林彪被叶群和林立果裹挟出走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惟林彪的出走客观上表现出林彪与毛泽东和平分手，林彪的出走打乱了毛泽东的整人步骤，使毛泽东的文革神话波灭，唤起了人们的觉醒，宣告了文革的破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林彪的出走具某种积极的意义。

（3）现有的官方关于“九一三事件”的叙述，大都是围绕在前台处置此一突发事件的周恩来、汪东兴和北戴河8341部队的活动，却几乎没有关于毛泽东的态度，似乎只有林彪的飞机快到中蒙边境时周恩来向毛汇报，才引出毛的“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那句话。除此之外，毛似乎没有任何其他表示。这不能不使人感到蹊跷。北戴河的警卫部队要向北京的上级汪东兴报告，汪向周恩来报告，周面对如此之大事只能向毛泽东报告。面对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林彪，周恩来绝无可能自行其是，自作主张。那么林豆豆在北戴河得到的“中央”指示：“与林彪等人一起上飞机”，又是来自何人呢？笔者认为，毛泽东在整个事件中的作用还有待研究者下功夫予以深入探讨。

（4）林豆豆在整个事件中的作为的确有一些可议之处。笔者认为，林豆豆的失策是，没有及时与林彪沟通，过于相信自己的能力，以为在自己的布置下就可以防止不测事件的发生。这也是对中国上层政治斗争缺乏认识的结果。但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九一三事件”归咎于她的报告，毛泽东的“倒林”是既定之策，没有“九一三事件”的发生，还会有其他事件，林彪难

逃被整之厄。事实上林豆豆也是这场政治斗争的受害者。即使没有林豆豆的报告，林彪的政治结局也好不到那里去，高岗、彭德怀和刘少奇的殷鉴不远，叶群等人焉能不怕？三十六计走为上应是叶群、林立果的首善之选，林豆豆以个人之力是无法阻止的。

最后还想多说一句。有关舒云女士整理的《林豆豆口述》一书，近来国内有些批评之声。笔者认为，舒云这些年来探索林彪何林彪事件，自费走访了很多当事人何知情人士，出版了《林彪事件完整调查》等多本著述，在这一领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些著述中难免存在一些问题，但是不宜以此全面否定舒云的辛劳和贡献，对《林豆豆口述》一书也应该站在客观、理性何善意的角度予以评论。

笔者认为，无论是韩钢先生的文章还是余汝信先生的文章，实际上都否定了官方多年以来强加给林彪的罪名：篡党夺权、阴谋政变、另立中央。《“九一三”回望》的出版将林彪事件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正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麦克法夸尔在该书《序言》里所说：“历史学者们掌握史料越多，就越来越不信任官方提供的版本。”诚哉斯言！

□ 《新史记》2013年8月 总第15期

~~~~~

【编者启事】

编者启事

本刊今年9月24日发出的“文革博物馆通讯”第七四四期刊登了吴林生的《歌曲〈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出笼》一文，该文系由李逊整理。应整理者的要求，在此特别说明。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